顾正忠：戒毒民警开辟“新战场”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本周四是“6·26”国际禁毒日。

劳教制度废止后，从今年2月起，本市首批69名司法戒毒民警被派驻到浦东新区、长宁区、普陀区、奉贤区4个试点区的街道（乡镇）司法所。浦东新区康桥镇司法所的民警顾正忠，就是其中一员。

和过去的社区民警、社工不同，司法戒毒民警可以开具强制隔离戒毒建议书，又承担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对象的心理疏导工作，可谓“一肩挑两担”。老干警在新环境里会遇上怎样的挑战？记者跟随顾正忠，体验了一名新型基层“禁毒卫士”的新生活。

■ 顾正忠在与禁毒社工商量工作 **康桥** 摄

戒毒对象先摸个“门清”

在康桥镇司法所，记者看到身穿便装的顾正忠，朴实随和。半年多前，2月19日，46岁的他刚刚换了新身份，由上海市司法局委派到浦东新区司法局康桥司法所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复试点工作。1989年上海市劳改劳教警察学校（后为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毕业后，顾正忠到上海市第三劳教所（现为上海市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20多年，劳教制度废止后，他成了首批“下沉”到基层的司法戒毒民警。在这里，大家更多时候不是叫他“顾警官”，而是“老顾”。除了在接对象出所、开具强制隔离戒毒建议书等场合身着警服外，很多时候，他都身着便装，“这样可以让对象放下戒备心理，和他们交朋友、方便做工作。”

老顾的办公室与社工办公室紧挨着，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也是互相配合的。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年的禁毒女社工周非亚短发精干，对这里涉毒人员的情况很了解，老顾则发挥在强戒所的管理优势，很快融入了这个新集体。

尽管只有1名戒毒民警，加上2名禁毒社工，却要负责康桥地区180余名社会涉毒人员，其中包括重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对象32名。但才来这里不到半年，老顾已经把每个重点对象都摸了个“门清”。

老顾家住松江，每天需要跨越黄浦江行车几十公里到浦东上班，早上6时多就要起身，虽然规定的上班时间是8时30分，但他8时左右就到岗了。

上午来到单位，老顾先打开电脑，进入浦东司法局等网站，了解最新的相关信息和工作要求。同时，在网站上，每个对象的基本情况也一目了然，老顾的工作表上记录好每个重点对象定期尿检等的时间，还要和对象们保持“热线”联系，了解他们的最新动向，结交了什么朋友、家庭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复吸的苗头等等。“和过去在强戒所里以管为主不同，到了社区里，对象散落在各个地方，靠‘盯’是‘盯’不住了，关键还是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帮助服务，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彻底和‘白魔’绝交。”

“第一次打交道很关键”

在事先电话联系后，老顾开自己的私车——一辆开了7年的普通家用轿车，来到一名戒毒对象王离（化名）家。王离，36岁，今年4月从强戒所回到社区。“为了照顾对象的感受，家访我们都不开警车，免得对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老顾介绍，30多岁的王离是今年刚从强戒所出来的，虽然是单亲家庭，但母亲原来开个小公司，他也曾在一家房产中介做销售，家境还不错。

他一度结识了个白领女友，但两人一起赌球赌得倾家荡产，女友也离开了他。他又结识了一批社会上混的朋友，开始“溜冰”。最初“小来来”，后来嗜毒成瘾，甚至一度产生幻觉，有一次还冲到派出所说“有人要杀我！”还有几次，吸毒后神智不清，甚至打算自杀，幸亏被母亲及时拦下。但毒瘾过去后，他居然对这些印象全无。原本溺爱儿子的母亲无奈之下，选择举报儿子，亲自把他送进强戒所。

走入王离家，记者发现，和多数瘦骨嶙峋吸过毒的人不同，他人微胖，但面色仍显得有些苍白。他和母亲热情地将我们迎进门，即使听到记者的身份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戒备心理，因为他们早和社工、戒毒民警成了朋友，对他们充分信任。“第一次打交道很关键，一定要让对象觉得有信任感，把你当朋友。一旦产生戒备心理，以后再做工作就难了。”为了王离的事，老顾不时打电话、上门和王离及他的母亲交流，平均每周至少1次，随时掌握王离的最新情况。

听说王离每个月花钱如流水，月开销要七八千元，老顾看到王离递来的一支中华牌香烟，就顺势做工作，“现在没工作还抽中华好像不太好吧，二三十一包的香烟也蛮好了。靠老母亲坐吃山空总归不是办法，要是有一天她不在了怎么办？总要趁着年轻学点本事的。”看到王离有些动心，老顾又趁热打铁，“你回来也好几个月，也调整好了，该找个工作了，生活可以充实点。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经过多次了解，老顾发现王离走上歧途，母亲的教育方式也多少存在问题。虽然物质条件不错，但王离从小就送全托，母亲疏于教育。由于成绩不好，王离没考上高中，只读了中专，学校里校风不好，又在社会上结交了一批“混”的朋友，走上了歧途。老顾为此也同时做王离母亲的工作，让她“摒牢”、控制王离的开销，平时多关注王离的交友情况，每个月给他不超过3000元。

经过家庭、民警双方配合做工作，王离的开销控制了，也减少了和社会上不良朋友的交往。他从出强戒所至今，没有复吸，一直愁眉不展的母亲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不离不弃是最大动力

离开王离家，老顾又联系了另一名戒毒对象许放（化名）。这名中年男子，去年12月从强戒所回到社区，除了人很瘦，精神状态很好，言谈举止大方，让人难以将他和吸毒者联系上。今年44岁的他已经有了近20年 的吸毒史，自己都说，“不知道几进几出了”。

许放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女友和一份还不错的收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做生意成功，成了“先富起来的人”。那时候许放收入高，上海滩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都要去试试，吸食海洛因在他看来也是件“时髦”的事，抱着好奇的心态尝了第一口，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倾家荡产。因为吸毒，许放几进几出强戒所，毒瘾最重的时候，有时候出来没几天，就又发作“再进宫”。

老顾说，其实许放的家人开始时候并不配合民警、社工工作。尤其是许放的父亲对儿子非常溺爱，甚至有时候上门给许放做工作，许放的父亲还为他当“挡箭牌”，说他不在家。直到看到儿子已经完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父亲才主动提出，把儿子送去强制戒毒。不久前，父亲去世了，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吸毒的儿子。“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许放说，“要不对不起刚去世的父亲，还有对我那么好的母亲、妹妹。”

尽管许放倾家荡产，但妹妹将购买的房子给许放住。许放现在无业在家，生活开销都是妹妹承担的。因为害怕周围的人用有色眼镜看他，许放很少出门，出来吃饭时候才到家附近的老街上走走。

“要彻底戒断毒瘾很难，从我们接触的各种对象中，很多人一旦吸毒就从此被‘戴帽’，许多人妻离子散，周围的人也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本来就意志力薄弱的一些人干脆破罐子破摔，走上老路。”老顾说，因此，家庭和社会的帮助对他们至关重要。

记者手记

戒毒为什么这么难？

之前在劳教所、强戒所，现在转战到社区，顾正忠和吸毒者打了20多年的交道，戒毒为什么这么难？

老顾用多年经验感觉到，其中主要原因很复杂，最重要的是吸毒者主观原因，但社会各方面不歧视、多伸出援手，也是让吸毒者“归来”的重要因素。老顾曾经接到过吸毒者求助，说自己明明符合办理低保的条件，但办事人员却对他爱搭不理，拖着不办。他特地打去电话帮他说理，才办了下来。由于社会排斥，一些吸毒者只好又找到“老朋友”，走上老路。如果能给他们一些温暖、平等相待，很多吸毒者还是愿意敞开心扉，开始新生活的。

吸毒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吸毒却必须都有“情”字做基础。在康桥镇，每个戒毒对象回归社区后，戒毒民警、社工都会为他们办理一笔一次性补助，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还有的家庭对吸毒者不离不弃，家庭的精神支柱成为吸毒者成功戒断的最大动力。

相关链接

69人的新行当

在大墙内工作了20多年，走入社区的“新战场”，顾正忠承认，开始时候自己有些迷惑。在强戒所里，所有工作都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工作方式也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按部就班，要掌握戒毒对象的情况也很容易。但来到社区的“新战场”，老顾开始时候有点“找不到北”，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熟悉适应新环境。

作为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正在本市试点的首批司法戒毒民警共有69名，已经在社区里发挥着公安社区民警和社工的桥梁作用。公安社区民警通常采用强制手段对吸毒人员进行管理，社工主要通过心理等手段帮助戒毒人员回归正常生活。司法戒毒民警的职责则介于两者之间，隶属于司法系统，挂在各街镇司法所下，虽然没有强制执法权，但对于吸毒人员可以开具强制隔离戒毒建议书，也可以帮助吸毒人员疏导心理、戒断毒瘾。

但由于现在司法戒毒民警的编制属于原单位，具体工作却挂靠在司法所里，顾正忠表示，有时在管理上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甚至偶尔还会“撞车”。同时，由于这是一项试点工作，目前主要依据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出台的《关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暂行规定》，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也让实际工作中缺乏一定的法律依据。